

经济学家

Teahouse For Economists

茶座

精华本
2

金明善 主编
詹小洪 执行主编



山东人民出版社

小镇的茶馆

金明善

小时候生活在一个不大不小的镇上,镇所是公社驻地,约有千把户人家。镇上有一条东西大街,是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每逢阴历一、六大集,又是较繁荣的农贸市场。伯父家有里外两进的房子,其临街的三间开了一个茶馆,门头上挑着一把烧黑的漏铁壶算是幌子。时间也就在“文革”前吧。

说是茶馆,实际上主要是卖烧白开。房子的西间,垒着一个长炉灶,灶头放一个大风箱,拉起来可以一排同时烧五六个方铁壶,每个铁壶能盛两暖瓶水。另外两间,有两张破旧的八仙桌和几条长凳,也就算是茶座了。

镇上的人有喝花茶的习惯,但一般人家并无专门用来烧开水的炉子,做饭用的馏锅水是不能用来泡茶的。因此,伯父家的茶水买卖很是兴隆。记得为方便交易,我还专门帮他制作发行了水票,也就是找来一些白板纸,剪成寸把长的长方条,再盖上伯父的手印章也就行了。现在看应算是有价证券。镇上的人,特别是像派出所、供销社和公社机关的那些吃公家饭的人,一次买上5块钱的水票(批发优惠,可买200张),两三个月的开水供应也就有保障了。好在当时做这样的生意并不征税,吃公家饭的人喝开水也都肯自己掏腰包,并没有人讨要发票回单位报销。否则,伯父的买卖肯定做不成,更不用说发行有价证券了。

茶馆的茶座生意似乎不太能赚钱,整天坐在茶馆里的多是街面上一些游手好闲的人。但他们关心镇上的大小事,信息比较灵通,大到年景收成预测,小到柴米油盐物价指数景气分析,张家长,李家短,道听途说,时时发布。直到伯父的紫红泥茶壶的茶根冲泡得一点颜色都没有了,他们还不肯离开。倒是经常有乡下到镇上办事、赶集的人肯舍得花上两毛钱要一壶新茉莉花茶喝。偶尔也能看到一些出苦力的人来到茶馆,但多数进门就抄起水舀子,冲着水缸喝生水。

如今,这样的茶馆城里头没有,小镇上大概也见不到了。无论如何我们的《经济学家茶座》应该有一席之地,尽可能地关注那些带有乡土气息的茶客们的生活方式和精神需求,不要使其在情感上远离我们!

目 录



【卷首语】

金明善 小镇的茶馆 001

【国是我见】

朱 玲 从“土地换养老”开始 007

朱恒鹏 我这一辈子：一个老农眼中的土地制度变迁 013

谁的新农村：土地何不归农民所有？ 021

多收了三五斗：如何让农民富起来 029

李海舰 解在哪里？——求解之道 036

十大关系新论——基于企业经济的视角 042

张晓晶 能否超越经济增长？ 049

赵 晓 中国和日本的比较：给中国的愤青朋友 053

罗肇鸿 中国人没有理由沾沾自喜 062

王松奇 漫话世界一流强国的三维标准 067

为什么说“大陆缺个李国鼎”？ 072

王东京 政府改革的经济学逻辑 076

周为民 改革以来，社会平等程度是降低了，还是提高了？ 080

顾海兵 北京与台北居民实际生活水平的比较：20%的差距或4年的滞后 082

富景筠 资源丰富是经济成功的条件吗？ 087

黄有光 大城市是否应该限制外来移民？——兼谈报酬递增与E-F冲突 092

王则柯 经济学常识与“人文关怀”迷雾 096

【学问聊斋】

- 刘福寿 中国经济学患有“贫史症” 099
- 李海舰 学术论文的规范与创新 103
- 黄有光 如何善用经济学这副小孔透视镜? 115
- 陈 抗 资本家为什么要破坏资本主义? 119
- 梁小民 我与现代经济学 123
- 王建国 千万别把经济学家错当管理学家 129
- 张晓晶 经济学到底有什么用? 132
- 王跃生 经济思维与“经济学价值” 136
- 吴 思 弯腰下跪:命—财关系曲线 140
- 陈争平 马克思思想的另一半 147
- 王则柯 经济学讨论中的假设和模型 152
- 设验甄别有学问 158
- 史晋川 “吃狗屎”的国民生产总值? 163
- 陆 铭 把实证研究进行到底 166

【学界万象】

- 党国英 不要妖魔化主流经济学 170
- 卢周来 中国的非主流经济学:一个初步的综述 177
- 李文溥 被“殖民化”的“经济学帝国主义” 183
- 王跃生 闲话“主流经济学家” 187
- 黄有光 关于国际主流经济学学术规则的对话 192
- 杨小凯 医学和经济学的主流和非主流 202
- 韩德强 智者克鲁曼,识者张五常 207
- 熊秉元 谷粒与粗粮——主流经济学与中国的非主流经济学家 210
- 赵 泉 “土鳖”伯克利“淘经”记 216
- 荆林波 谈海归派本土派之争 219
- 李茂生 专业领域的名人及其“物”与“值” 223

- 李 斯 “北京籍籍经济学人”群体扫描 227
- 本 力 经济学的“江湖” 233
- 饮 冰 经济学教育诸侯的生财之道 239
- 夏业良 经济学界资源配置的扭曲 245
- 陆 铭 经济学界的 50、60、70、80 252
- 李中建 青年经济学子如何迅速成名 254
- 顾海兵
曹 帆 中国高校财经院系近亲繁殖程度五倍于国际水平 259

【经济随笔】

- 陈 抗 以小人之心度小人之腹 266
- 汤铎铎 叔本华的豪猪和哈耶克的知识 271
- 朱恒鹏 为何把牛奶倒入大海 276
- 蒲勇健 布吉之谜：油画市场之经济学诠释 285
- 美、孔雀的尾巴与信号博弈 290
- 曹利群 一个小山村的产权故事 295
- 熊秉元 报应 299
- 郭梓林 “成本”的经济学随想 302
- 董国政 因战争而受益的十类人 307
- 陈彩虹 制度是人性弱点的产物 312
- 王玉霞 刘文彩 VS 周扒皮——张维迎 PK 张五常 317
- 叶楚华 关于刘德华的若干经济解释 321

【生活中的经济学】

- 徐昌生 婚恋需要经济学——火车上的一次偶遇与即兴解答 327
- 韦 森 司机点烟的经济学分析 331
- 赵 刚 爆竹声中的启示 337
- 姚 洋 上当与同情心 342
- 朱恒鹏 周扒皮为什么半夜学鸡叫？ 344

- 许 斌 我预测了上海车牌价格 351
- 王 寻 乞丐为何不愿接受救助 354
- 李仁君 边际收益递减的故事 357
- 张宇燕 马桶效应 361
- 郭艳茹 凿壁借光与沽名钓誉 363
- 曹安南 房价为何居高不下 366
- 孙 晔 和孩子一起读《寓言中的经济学》 369

【经济评论】

- 韩朝华 保护私人产权是保护大款吗？ 373
- 赖德胜 科尔内的价值与智力外流 376
- 陈 抗 三种忠诚——也谈退出机制 379
- 王松奇 格林斯潘想什么 383
- 张曙光 生财聚财与疏财散财 389
- 顾海兵 北京黑车之白 393
- 吴要武
赵 泉 自然资源：神赐天粮还是魔鬼的粪便？ 398
- 俞炜华 富人的经济学 404

【经济学人】

- 柳 红 如果你是大海，舀出来一勺，还是大海——记吴敬琏论学 407
- 薛小和 父亲是学者，公公是理财家 412
- 岑 科 茅于軾与青年经济学人 422
- 梁小民 北大经济系师长杂忆（一） 428
北大经济系师长杂忆（二） 436
北大经济系师长杂忆（三） 444
- 聂辉华 一个大陆学生心中的杨小凯 452
- 张友仁 蒋硕杰教授的经济学人生 456
- 王梦奎 北大经济系旧事 463

【经济史话】

- 梁小民 走西口与晋商(一) 467
赵人伟 对改革初期“曼德尔旋风”的回忆与思考 472
朱荫贵 老股票的故事(一):近代中国第一股 476
王小嘉 话说鹰洋 482

【他山之石】

- 陈彩虹 博弈“猎头”在汉城 486
黄燕芬 德国大学的经济学排名 494
詹小洪 看韩农,思华农 498
巴曙松 从格林斯潘的“不作为”谈起 501
张宇燕 印度之行 504
陈 宪 我在欧洲坐廉价航空 508

董全瑞 品茗评《茶座》(代后记) 511

主编 金明善
副主编 刘德久
执行主编 詹小洪
责任编辑 董新兴 陈丹丹
山东出版集团
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济南市胜利大街39号 邮编 250001
<http://www.sd-book.com.cn>
编辑部电话:(0531)82098906
E-mail:chazuo4901@sohu.com
发行部电话:(0531)82098027
邮购电话:(0531)82098021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经济学家茶座精华本2/金明善 主编
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7.2
ISBN 978-7-209-04190-4
I.经… II.金… III.经济学-文集 IV.F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7)第013802号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印刷
2007年2月第1版 2007年2月第1次印刷
172×232毫米 16开 32.25印张 500千字
定价:35.00元

从“土地换养老”开始

朱 玲*

在城市化和工业化的进程中,失地农民的出现成了迄今为止不可避免的事情。即使在工业化吸纳了绝大部分农村劳动力的地方,如何补偿失地人口的经济损失,减轻和消除他们失地的精神痛苦,也依然是对政府稳定社会能力的挑战,同时还是对当地社会能否维护正义的检验。苏州市各级政府以应对这一挑战为契机,借助收入再分配手段,通过“土地换养老”的方式,不但在保持社会稳定的前提下满足了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土地需求,而且还在很大程度上改写了中国乡土社会依赖土地应对家庭经济风险和养儿防老的历史,为建立城乡一体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奠定了基础。这是笔者2005年4月下旬在苏州市所属的吴江、常熟和张家港做农村调查时得到的初步印象。

一、“土保”与“农保”

在苏州地区,农村居民把与征地相联系的长期性补偿叫做“土保”,把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称为“农保”。关于“土地换养老”的信息,笔者最初是从吴江市七都镇社会保障所获悉的。后来从市里发放的《农民素质教育读本》^①中得知,自1992年始,当地就已经针对被征地人员建立了个人养老保险制度。最近的规定是以征地批准之日为限,把被征地人员分为3个年龄组,由国土部门给予不同的经济补偿:16岁以下的年龄组按每人6000元的标准一次性发放生活费;16岁至60岁(女性55岁)的年龄组参加农村或者城市基本养老保险;60岁以上的男性和55岁以上的女性从征地当年开始,每月领取基础性养老金80元。对16岁以上两个年龄组

*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① 参见《农民素质教育读本》,吴江市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办公室编印,2005,第23~32页。



的被征地人员,国土部门按照人均 20000 元的标准,向社保所一次性划拨养老金,由后者负责管理和发放。据社保所的工作人员介绍,苏州地区各乡镇经济实力不一,有的乡镇发放的征地补偿和养老金实际上还高于上述标准。

七都镇望湖村(原名染店浜村)的村医叶雪宝概括说,镇上推行“农保”用的是“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对此,他和儿媳俞明娥以自家为例耐心地向笔者讲解了一番。他们把“土地换养老”得到的补偿简称为“土保”,把基础性养老金叫做“养老补贴”。叶家 6 口人四代同堂,除了一位正在上小学的曾孙辈(11 岁)以外,其他家庭成员都已纳入镇上的养老保险体系。老叶夫妇(64 岁)和老母亲(85 岁)不仅每人每年从镇上领取 880 元“土保”,而且每人每月还能领到 80 元养老补贴。俞明娥和丈夫现年 34 岁,如今每人每年缴纳 480 元养老保险费。待她俩分别年过 55 和 60 岁的时候,即可按规定每人每月领取 200 元养老金。叶家每年大约消耗 2000 来斤大米,总共花费不到 3000 元。这样算来,他们认为“土保”加养老补贴抵消失地的损失还绰绰有余。老叶和儿媳在村卫生室行医,平均每人年收入 8000 余元。儿子 2004 年之前在姐夫的电解铜厂帮助进出货,年收入 5 万多元。自 2004 年始,他和另外两家住户合伙办了一个木门厂,雇用工人 20 多名。可见,叶家早就不靠土地生活了。

二、社区服务与养老

尽管苏州农村的大多数住户已经不事农耕,农村人均收入(2004 年达 7600 元)远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但养老保险制度对于社会稳定依然至关重要。在笔者进行抽样调查的十多个村庄,60 岁以上的老年人占总人口的 20% 左右,整个苏州地区的人口结构也显示出老龄社会的特征。因此,依赖子女收入养老的模式日益难以保障老龄人口的经济和社会权利。目前的“土保”和养老金制度不仅为老龄人口提供了经济安全,而且赋予他们一个具有尊严感的晚年。张家港市塘桥镇韩山村一对养老金领取者自信地对笔者说,他俩和儿孙住在一起,光是从村镇得到的各种补贴就足够全家吃饭了,不需要儿子给钱。这家的户主姓肖(60 岁),从 1973 年起在村里当生产队长,现在还是村民小组长。为此,目前他每年还领取 3000 元的工资。夫人姓陈(57 岁),原籍徐州农村。1967 年她和姐姐在上海当保姆,在那里认识了一位当厨师的韩山村村民。经姐姐和厨师搭桥,当年的小肖去上海与小陈相亲。那时韩山村一个劳动日的工分值还不到 1 块钱,小肖去一趟上海的火车票

要 2.71 元。他在一年时间里跑了几趟,于 1968 年把小陈娶回了家。如今,肖家的耕地已经全部被征用,村里规定不论男女 55 岁都可以领取养老金。因此,现在的老肖和陈每人每月都能领 80 元。此外,老肖一家 5 口还能领取 7000 元的土地补偿,因为当地规定的补偿金数额是每人每年 1400 元。

经济自立仅仅是老肖夫妇幸福生活的一个基础,丰富的社区活动和人际交往,则更增添了他们的快乐。韩山村的社区活动中心就在居民小区附近,村委会办公室、卫生室、文体活动场所和餐厅都设在那里,老陈每天都去做健身操。她说,村卫生室每年为妇女免费做 2~3 次体检,村委会为了鼓励她们参加,每次体检还给每个参加者发 5 元钱,这是镇政府和村委会在给老百姓办好事。她特别喜欢村里组织的唱歌和健身活动,即便不发钱也愿意去。韩山村在苏州地区是工业化程度较高的村庄之一,村委会每年凭借出租厂房和收取企业电费,可以得到 100 万~200 万元的财务收入,显然具有为村民提供娱乐设施和健康服务的经济实力。不过,即使在农业经济比重较大的村庄,村民也同样能够享受有组织的社区文体活动。笔者走访吴江市同里镇九里湖村的时候,恰逢周末,社区活动中心聚集着众多村民。青少年有的打乒乓有的赛篮球,老年人有的聊天有的打牌,男女老少其乐融融。这种景象无论是在大都市还是在欠发达乡村都不常见,然而在工业化进程中的苏州农村,却是居民生活质量提高和社区认同感强化的普遍标志。

三、社会养老与家庭照料

苏州农村的养老保险和社区服务,可以说是保障老龄人口基本物质需求和精神愉悦的新生社会制度。值得注意的是,家庭照料老人的传统功能不仅依然存在,而且与这些现代制度相辅相成。苏州农村属于计划生育政策贯彻较早的地方。笔者访问的家庭十有八九都是三代或四代同堂,家庭规模却只在 5 至 7 人之间。如今 50~60 岁的人一般都有两个子女,多数更年轻一些的夫妇只有一个孩子。不少 50 多岁的人已经有了孙辈,依照当地以往的风俗,他们依然倾向于和儿子生活在一起。不过,这种家庭模式随着人口结构的变化而不得不悄然“移风易俗”。常熟市董浜镇北港村(原名徐市镇树弄村)秦世根老人的家庭结构,便能反映出这种风俗习惯的嬗变。

秦老今年高龄 81,夫人 78 岁,养育了三女一子。儿子和儿媳现年 53 岁,膝下仅有一女(28 岁)。秦老的孙女结婚后与夫婿同住秦家,如今小两口育有一子(1

岁),秦家因此而成为四代同堂的大家庭。秦老的儿子很早就与其他3家村民合办了一个化纤厂,1995年动用多年积累的分红所得,花费50多万元在自家宅基地上造了一座小楼,估计使用面积在300平方米左右。秦老的孙女和孙女婿在邻近的梅里镇与别人合伙开编织厂,由于当地交通方便,平时还是在家里吃住。秦姑娘介绍说,大家庭的日常开支主要由父亲承担,他非但不向小两口收费,反而时常补贴他们。其实,她的小家庭并不缺钱,一旦父母需要,她俩就会拿出钱来接济。

事实上,在几代同堂的扩展式家庭里,即使是高龄老人也并非都是照顾对象。在多数情况下,全体家庭成员通过劳动分工,实现了代际之间的相互照顾和人力资源的有效利用。与现有人口结构相适应,董浜镇政府对老年人口区分年龄段制定养老金发放标准。60~70岁年龄组每人每年可领取养老金800元,70岁以上年龄组的养老金标准为1000元/年·人。优惠高龄老人的主要原因也许一方面在于他们获取收入的能力低于其他成人组,另一方面是高龄老人组的医疗支出在一般情况下明显高于低龄组。不过,前面提到的秦世根夫妇至今尚无大额医疗支出。二老身板均健朗,不仅不需要家人特殊照顾,而且仍在参加劳动。笔者从村委会乘摩托车去拜访他们的时候,秦老稳稳当当地骑着自行车引路,到他家门口一看,出来迎客的秦老夫人原本正在厨房做饭。平日里,侍弄4亩菜地是老两口的一项主要活动,而且全凭人工,连翻地都不靠机械而是用铁锹。收获的鲜菜经筛选后冲洗得干干净净,捆扎得整整齐齐,由秦老挑到市场上去卖。菜地的灌溉由村里付水费,扣除自付的种子化肥农药等成本,二老一年能得种菜净收入1万元左右,相当于他俩当年养老金总额的5倍。其实,就他们儿子的赡养能力而言,二老在家赋闲也并非不可能。笔者问他们,如今种田是因为不得不做还是因为喜欢做?秦老简单地回答:“因为习惯了。”

秦老的行为和答案显示,只要不是被迫劳动,只要是做力所能及的事情,劳动习惯不仅有益于维护老人的身心健康,而且还能延长他们的劳动力使用期,从而增加社会人力资源总量。在苏州地区,由于经济连年增长、就业机会良多,老年人、特别是低龄老人或多或少地还获得了调节个人经济活动种类和工作量的选择空间。笔者在北港村访问的另一位村民石保生(62岁)原先在建筑队做工,2004年5月因高血压突发脑中风,康复后就留在村里和老伴(64岁)一起种菜。与秦老夫妇略有不同的是,石家的菜地面积为6亩,采摘的蔬菜由小贩到地头收购,两人每年种菜的净收入在15000~16000元之间。此外,他俩从镇政府获得的养老金(800元/年·人)虽然不及秦老夫妇多,可老石从年过60(2004年)起,每年还从民政部门领取

1500 元养老保险,因为他在 1996 年一次性付给民政局筹办的养老基金 12400 元,基金给付的规定是一直按此标准支付到投保人去世为止。这样算来,石家夫妇当前的年人均纯收入在 9000 元左右,显然高于全国农村平均水平。不仅如此,他们的保险意识也领先于一般农户。从 1979 年起,他俩就参加合作医疗,现在不但为自己投保,而且还替儿子、儿媳和孙女缴纳合作医疗保费(50 元年·人)。对此老石解释道:“出这个钱是为了防大病,没有大病不报销最好。”他去年因中风住院两次,共花费 12000 元,其中住院费用 9428 元,从合作医疗基金报销 2431 元。有了这番经历,他的话必然发自肺腑。

四、政策讨论与小结

1. 在当今中国,农村土地使用权不但是农民赖以谋生的收入来源,而且还是大多数人口的生存保障。以征地形式进行的农地交易往往使买卖双方处于不平等的交易地位,作为卖方的农民面对处于强势地位的买方(政府)难以展开实质性的讨价还价。通常农民得到的征地款额不可能如同农地那样赋予他们长期的生存保障。然而为全体国民提供这种保障正是政府的责任,苏州市各级政府在农村工业化进程中,用土地换养老的办法推进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建立,可以说是切实承担起了这份应负的责任。虽说目前农地为集体所有,就政府正在行使的征地权而言,国家在现实中也分享一部分所有权。在这个意义上,苏州地方政府的做法可以视为动用国家对土地的权利或者说国有资产,为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催生。这与政府向城市社会养老保险基金注资的道理相似,只不过主流舆论对动用国有资产补偿城市国企职工已经习以为常,却很少把农民对国有资产的权利视为理所当然。

2. 苏州地方政府对从未缴纳过保费的老龄人口定期发放养老金的做法,在政策层面上,意味着对尚未具备养老金领取资格的群体出示了政府的信用,这无形中发挥了促进农村人口投保参保的动员作用。从“农保”运行的轨迹来看,纳入“老人老办法”的群体较之那些执行“新人新办法”的人从“土地换养老”中获益多一些。然而如果观察人类发展的历史链条,上一代人不但曾经供养过他们之前的一代,而且还为下一代提供了物质积累,那么从代际公平理论^①的角度考虑,苏州“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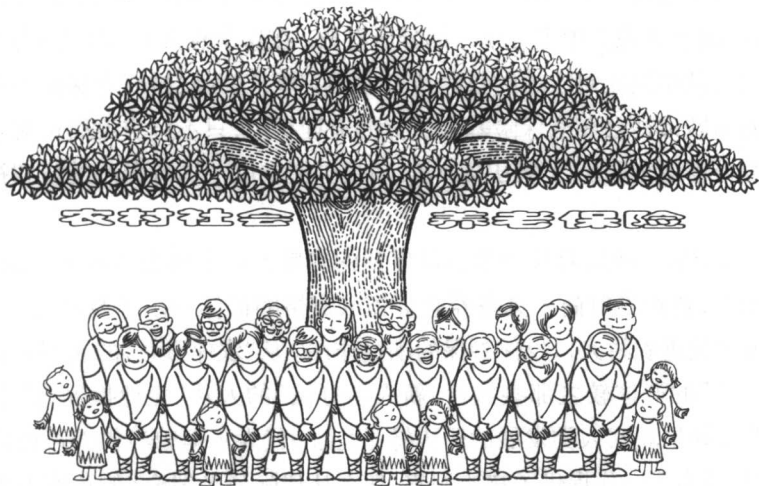
^① 参见罗尔斯:《正义论》(中译本第 285~294 页),1971 何怀宏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8 年版。



保”建立之初采取的过渡性制度可谓一项体现了社会正义的政治决定。

3.近20年来,我国农村人均预期寿命明显延长,这既是社会进步的一个标志,又表明需要供养的老龄人口逐渐增加。不少发达国家采取推迟退休年龄的措施,来回应类似的人口变动趋势。与此相伴随的政策,是通过终身教育和健康服务促进老年人力资源发展。我们的苏州农村案例表明,在以养老金保障生存的前提下,在周到的社区服务与安定祥和的家庭照料环境中,老龄群体参与生产劳动的期间远远超越了我国通常的退休界限。这对解决人口老龄化过程中青壮劳动力相对减少的问题,不啻是提供了一个可操作的备选方案。

4.苏州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建立以工业化或者说非农产业的发展为前导。如今尚且缺失这一前提条件的地区显然难以建立类似的制度。然而即使是欠发达农村也具备了人口老龄化的特征,因此需要政府采取老年生活保障措施。各地究竟以何种方式推行养老保障,取决于当地的社会经济文化因素。近年来,民政部门对农村特困人口的补助有所加强。当前这一政策的受益者主要是最贫困的孤寡老人,可是那些生活在一般贫困状态和贫困线边缘的老龄群体还未被覆盖。因此,如今无论是扩大补助面还是提高补助标准,都必将彰显全社会互助共济保障老龄群体基本生活需求的价值观,同时增强公众的社会安全感和认同感,从而为发展壮大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打下坚实的社会理念基础。



背靠大树好乘凉 (倚天)

我这一辈子：

一个老农眼中的土地制度变迁

朱恒鹏*

回乡探亲，遇土生老爹。老人年届八十，人生阅历丰富，且读书颇多，又兼关心时事，熟悉政府有关三农政策，村中威望极高。多年未曾谋面，老人见我甚是高兴，老少二人把酒话桑麻，聊得很是投缘。老人讲述一生经历，无意中从一个亲历者的视角反映了建国以来的农村土地制度变迁。笔者整理如下，以飨读者。

一、土改：终于拥有了自家的土地

“那可是个好辰光！”说这话时，老人眼中露出少见的光彩，“解放了，地主家的田地、房子还有牲畜全部分给了穷人！那时我刚刚成亲，家里也分了十亩地、一头牛！祖祖辈辈的梦想终于实现了，我们那个高兴啊！做梦都会笑出声来。”

“我知道，那是‘土地改革’，简称‘土改’，”这个话题很合我的兴趣，“就从土改开始，给我聊聊你这一辈子经过的事。”

“好！好！既然你愿意听这些陈谷子烂芝麻的事，我就和你聊聊。”老人也颇有兴致。

“土改把地主的土地和牲畜分给大家，分得公平吧？”我问道。

“应该算很公平！基本都是平分的，比如，我们家和隔壁长庚家人口一样多，分的田地和牲口也就一样多，都是十亩地、一头牛。”

“终于有了自家的土地，我们两口子合计着一定要好好干，我们相信土地不会糊弄人，你流多少汗，它就给你多少收成！”

“那几年，我们两口子农时每天天不亮就下地，天黑了才回家，地里一棵杂草都没有！不管种什么，我们的产量都比别人高出一截。夜里我们轮流起来给牛喂料，牛那个膘肥体壮！我们很爱惜它，它也很对得起我们。”

*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



“每年我们拿出六七亩地种粮食，打了粮食自己吃和交公粮，价格合适时也卖一些。其余三四亩地种些经济作物，拿到集市上卖钱。我们合计着，好好干，攒些钱再买十亩地，一头牛！让日子越来越红火。”

“你很会做买卖吧？”我记起老人曾被割过“资本主义尾巴”。

“说不上很会，就是比别人多动点脑子。乡亲们都种黄瓜时，我就种西红柿，这样西红柿可以卖个好价钱。等来年大家都种西红柿了，我就种黄瓜，反正不随大流！这样，我们种的东西总能卖个好价钱！”

“很有市场意识嘛！”我恭维道。

“我不懂啥市场意识，只是比别人多动点心思，腿脚勤快一些，多了解些情况。

“农闲时我们两口子就做豆油卖，一是赚点钱，二是可以做些豆饼喂牛，以及做肥料施到地里去。你知道地里施豆饼，地力增加得又明显又长久，比现在的化肥强多了。由于经常给地里施豆饼，我们家地力特别肥，要不产量咋能比别人家高出一大截！”

“也就三五年光景，我们家粮缸里装满了粮食！也攒了一些钱，我们又买了十亩地和一头牛，地多了，有时忙不过来，就要临时雇短工。日子是越来越红火。”

“其他人家呢？”

“差别很大，”老人说道，“就拿我们家和长庚家来说吧。土改时同样是分得十亩地、一头牛，我们年龄一样，家里人口也一样，可也就三五年光景，两家的境况差别就很大了。”

“长庚两口子都不是勤快人，天天太阳晒到屁股才起床，地里杂草比庄稼还旺！打的粮食交完公粮后全家吃饱都勉强，根本没余粮可卖！两口子种点蔬菜也懒得伺候，自家吃还可以，卖钱是卖不出来的。农闲时两口子就蹲在墙根儿晒太阳，也不找点事做。”

“两口子还特嘴馋。特别是长庚，三天两头卖了粮食换酒喝。大概土改后第二年吧，为了买酒，他竟然把牛卖了。”

“说来两口子命也不好。土改第三年吧，他们大儿子莫名其妙地得了一场重病！治那病花了好多钱，他们哪有钱啊？最终不得不把十亩地都卖了。”

“不过还不错，尽管花了一大笔钱，那孩子的病最终治好了！可是病是治好了，他们却一无所有了，成了新兴贫农。说来也是，土改刚刚几年呢，他们家就又没有地了，可是怨谁呢！只能怨老天爷捉弄人，干吗让他儿子得那么一场大病啊。不过说来老天爷挺对得起我，那几年我们全家就没有一个生病的，连头疼脑热的小病

几乎都没有。

“造化弄人啊。”老人叹道。

“这其实很好理解,在这个社会上,每个人的起点都不一样,首先是父母留给的初始物质财富很不一样,其次家庭教育和成长环境形成的个人价值观有很大差异,再次是个人的自然禀赋包括智力和身体素质有很大的差异,还有就是个人后天的努力程度也不一样,最后一点是不确定性因素的差异,也就是我们平时所讲的运气的差异吧。长庚儿子得病这事就是一件典型的不确定性因素。

“在这些决定一个人一生成就的因素中,唯一可以拉平的只有初始物质财富,就像你和长庚,土改给了你们一个平等的物质财富作为起点,但是其他因素无论如何是无法拉平的,特别是个人的自然禀赋差异始终会存在,并显著地影响着一个人一生的成就。在这个过程中,不确定性因素的作用也非常大,有时甚至会造成很大的差异。当然,在存在较完善的保险市场的条件下,不确定性可以有所减少,但是却不可能完全消除。在个人的能力能够有效发挥并且个人的收益取决于自己的贡献的环境下,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就是这样的环境,这些因素的差异必然最终导致个人财富、成就、地位的差异。也就是说,在机会公平、程序公平的环境下,即使物质财富的起点是一样的,个体自然禀赋的差异也必然使得最终的结果存在较大的差异。换句话说,即使最初的物质财富是一样的,在‘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不得’的制度下(土地私有制就是这样的制度),那些无法拉平的个体差异必然会导致大家的收入出现差异,并导致最终的物质财富有很大差异。土改后几年你和长庚生活光景的差异反映的就是这种情况。”

老人没有理会我的掉书袋,等我说完,又按照自己的思绪聊了起来。

二、人民公社:不是我不明白,这政策变化快

“我没有想到的是,此后不久开始搞互助组,然后是初级社、高级社,最后是人民公社。人民公社让大伙儿把土地、牲口、大农具全部入社,成为公社的集体财产,也就是全体社员的公有财产。我想不通为什么要这样做,觉得不公平。你想想,我们家二十亩好地,两头膘肥体壮的大耕牛、两架地排车,还有那个小油坊,那可都是我们两口子起早贪黑拼命干、不舍得吃、不舍得穿攒下的,凭什么就成了大伙儿公有的?长庚家什么也没有,也成了公社社员,和我们一起公有我们入社的土地、牲口和大农具,你说这公平吗?”说着说着,老汉有点激动起来。



“长庚很高兴吧？”

“那还用说！他们敲锣打鼓欢迎人民公社。长庚还嘲笑我：‘怎么样？起五更睡半夜，不舍得吃、不舍得穿，现在还不是给大伙儿了？你看我，觉没少睡，酒没少喝，现在也是和你平起平坐的社员了。’你说气人不气人？”

“像我们这样家里地较多、有好牲口、劳力又多的人家就不痛快了。最初我坚决不同意入社，可是胳膊扭不过大腿，最后还是不得不入了。有啥法子？可我尽管作不得声，心里却不服气，凭什么把我的东西公有了？那最初的十亩地一头牛是你政府分给我的，充公就充公吧，我认了。可另外那十亩地一头牛是我拼命干活省吃俭用挣来的，你凭什么充公？”

“可想不开又有啥法子？家人劝我，集体了也有好处，大家一起干，只要人人都努力，合作得好，收成不一定比单干差。我觉得可能是这理儿，尽管心里不痛快，最初在社里干活还是像原先在自家一样，每天天不亮就下地，天黑了才收工。可我发现一些社员不像我这样，他们比在自家干活时出工晚，收工却早，而且活计也干得马马虎虎，一个人的活三个人干，磨洋工，有的甚至还偷粮食。我问一个偷懒的社员为什么不好好干活，可他反问我：‘我能拿多少？’想了好久，我终于明白了其中的道理，我们那个生产队有100来个劳动力，我每天早出工一个时辰，晚收工一个时辰，一年下来，能多打多少粮食？就算500斤吧，过去自家单干时，这多打的500斤粮食都是我们家的，每天多付出的两个时辰是值得的，可如今在公社里，多打的这500斤粮食100个人分，我只能得到5斤，每天多干两个时辰，一年下来才多得5斤，太不合算了。反过来看，我每天少干两个时辰，多睡点觉，损失什么呢？地里少打500斤粮食，如果是单干，损失全部是自家的，当然不合算，可是现在在社里，我个人只损失5斤粮食。每天多休息两个时辰，一年下来只损失5斤粮食，很合算的。我总算明白了，大家一起干活，勤快的人得不偿失，偷懒的却没有损失，那么多人一起干，多干了显不出来，少干了也看不出来，‘滥竽充数’说得就是这个理吗？”

“从道理上讲，如果能够根据每个社员的劳动贡献分配粮食，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不得，可以有效防止这一问题。但说来容易，实际上却做不到。那么多人混在一起，分散在那么大的农田里干活，监督起来非常困难，干活时用劲不用劲只有自己心里最清楚，干得认真不认真也只有自己心里最明白。监督的干部能看到什么？就是看到了，看到这里也就看不到那里。况且就是发现谁偷懒了，干部也未必较真，说来他也不过是百十个社员中的一个，多打了粮食他又能多得几斤？得罪